

曹丕作品考年三题

宋战利

摘要：曹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大量文学作品的皇帝作家。在曹丕研究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就其《典论》、《柳赋》的创作年代提出有别于前辈学者的看法，对“南皮之游”的时间亦有新的解释。

关键词：曹丕；典论；柳赋；南皮之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1)01-0089-04

一、《典论》作年考

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典论》创作于何时，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黄初时期说，二是太子时期说，三是建安十六年说。张可礼先生《三曹年谱》云：“《典论》恐非作于一时，基本成书当于是年（建安二十二年）冬大疫发生后不久。”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曰：“曹丕为太子，作《典论》。”刘知渐先生也认为完成于立太子后。曹丕立为太子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窃以为《典论》创作主要集中在此重大事件前后，即建安十八年（213）至二十四年（219），且黄初以后略有增补，试为略证之。

第一、荀彧劳军一事发生在建安十七年（212）。《典论·自叙》曰：“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载，十七年，曹操征孙权，“表请荀彧劳军于譙”。由此可知《典论》创作最早开始亦在此年后。

第二、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作于二十二年与二十四年之间。卞兰在上表中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又曰：“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曹丕立为太子。也就是说卞兰应在此年冬以后见到《典论》。卞兰还提到，“今相钟繇、大理王朗”，“咸归太子巍巍之美”。考《三国志·魏书·钟繇传》，繇为相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八月至二十四年（219）九月。

第三、《典论·论文》创作于七子亡后。《论文》

云：“融等已逝”。“融等”应包括徐、陈、应、刘诸子，他们皆亡故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前。当年十月，曹丕为太子，作书与王朗曰：“疾病数起，士人凋落。”可证曹丕为太子时还在创作《典论》。

第四、瘟疫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说疫气》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那么，到底瘟疫何时开始流行呢？大致应始于当年春三月，持续到当年十月左右，且是从南到北流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军居巢”，而王粲于此年春病卒于道，也就是曹军还没有到达居巢前。曹丕《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从曹丕《与吴质书》来看，王粲并非死于瘟疫，也就是说，正月时，疾疫还未爆发。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当年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此时，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中大疫”（《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司马朗三月到居巢时，亲眼目睹疾疫流行。曹操撤军，可能是因为疾疫爆发。此年三月后，徐、陈、应、刘，染疾而亡。

第五、“六子说”与“七子说”的争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对当时的文坛有“六子”说，即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和杨修。曹植书信提到他自己二十五岁，可知该书及杨修的《答临菑侯笺》皆当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曹丕《论文》提出“七子说”，因为当时兄弟二人的争夺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在文艺政策上也存在极大分歧。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若曹植看到过《典论·论文》，表明其对曹丕的文学批评持否定态度，他似在以刘季绪暗喻曹丕。若没有看到，曹植先提出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曹丕故意反其道而行，提出“七子”之说，

收稿日期：2010-04-28

作者简介：宋战利（1968—），河南兰考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文学研究。

并对他们各有评论。兄弟二人的作品应为同时之作，也就是说曹丕为太子前就在创作《典论》。

第六、《典论》创作的立嗣背景。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之后，曹丕、曹植兄弟才会有争立太子之战。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在洛阳辞世。建安十八年（213）至建安二十四年（219）间，是兄弟二人争夺继承权最为激烈之时。曹丕创作《典论》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图。曹操共有子男25人，长子曹昂死于战争之后，曹丕成为长子。但他明知曹植受宠，心中不悦又不敢明确表达，只有借助于文艺的形式。曹丕在《典论》的一些篇目中罗列众多历史上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帝王长子的悲惨命运，大力抨击妇人与政，批评袁绍、刘表在立嗣问题上立幼不立长，终致国破家灭，曹丕这些言论的劝说意义十分明显。曹丕倾注极大精力创作《典论》并积极传播自己的想法，“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不倦”。《典论》的创作与传播对曹丕争取继承权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从这一方面讲，亦可证明《典论》大多作于建安十八年（213）至二十四年之间（219）。

第七、黄初期间《典论》有所增补。黄初是曹丕称帝后年号。《典论》中有一篇《太宗论》，当作于黄初中。《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曹丕非常推重汉文帝，“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三年（222）十月，“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而《终制》亦为《典论》之一篇。《文选》卷二十三张孟阳《七哀诗》李善注曰：“魏文帝《典论》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云云。李善所引正是《终制》之文。

二、《柳赋》作年考

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系此赋于建安十九年（214），乃因“王粲、陈琳均有《柳赋》，但下年丕在孟津，粲、琳随操西征，故系于本年。”

张可礼先生《三曹年谱》、俞绍初先生《建安七子年谱》系于建安二十年（215）。刘知渐先生《建安文学编年史》同，并云：“夏四月，曹丕随军途中过某地旧居，看见自己十五年前所种柳树，已经成长，十分感慨，写了一篇《柳赋》。”刘先生没有言及柳树植于何地。

曹道衡先生《曹丕〈柳赋〉作年》^①一文认为

^①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从考》，中华书局，2003

此赋作于建安二十年（215）二、三月间，并认为树植于孟津，“官渡战时，袁氏据河之东、北，曹氏据河之西、南，洛阳、孟津当属曹军后方，丕其时驻此植柳”。此赋“杀青甫就，诸文士即随操西征，丕则留守”。

我赞同张、曹二前辈将此赋系于建安二十年（215），尤其曹先生论其作于当年二、三月间颇受启发。曹先生以为柳树植于孟津，似可商。窃以为此柳应植于官渡，十九年末曹丕路过见到曾植之柳，翌年始作此赋，现略证之。

第一、柳树植于官渡。五年时，官渡是主战场，也是曹操的重要防地，应是较为安全的地方，曹丕当在此地。故《柳赋》序曰：“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王粲同题作曰：“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抚军，植佳木于兹庭。”既然是“抚军”就要到官渡前线。《左传》曰：“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②

第二、十九年曹丕经过官渡。此赋的创作时间，序言交代很清楚，五年植，“十有五载”，当然是建安二十年（215）。但陆侃如先生将此赋系于十九年，盖以为二十年时，“太子在孟津”^③。十九年，曹丕随曹操征孙权，十月，因伏皇后之事，曹操引军还许。《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十一月或十二月初，曹丕随曹操由许还孟津的途中应经过官渡，并与王粲一起看到所植之柳和官渡营垒遗迹。故粲赋曰：“行复出于斯乡”，“观城垒之故处”。《水经注》卷二十二载：“渠水又左径阳武县故城南，东为官渡水，又径曹太祖垒北。有高台，谓之官渡台，渡在中牟，故世又谓之中牟台。建安五年，太祖营官渡，袁绍保阳武”。“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垒，公亦起高台以捍之，即中牟台也。今台北土山犹在。”曹操的故垒到北魏酈道元时犹存，曹丕、王粲见时应更明显。实因赶路返邺，当时并没有写作此赋。当年十二月曹丕随操到孟津。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二十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又《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云：“后太祖征关中，太子在孟津。”曹丕或是十九年留在孟津，或二十年复随操至。他的柳赋应创作于二十年春，并令随军出征经过孟津的

年，第35页。

^②《左传·闵公二年传》。

^③《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

王粲亦作。曹丕云：“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王粲应之：“悟元子之话言”，“人情感于旧物，心惆怅以增虑。”三月后，王粲曹操西征，其《从军诗》曰：“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二十年十二月，粲随曹操返。二十一年才到邳。也就是说二十年三月到二十一年二月间，曹丕和王粲没有机会唱和。

第三、《柳赋》所言的季节正是由冬转春之际。赋曰：“四时迈而代运兮，去冬节而涉春”；“盛德迁而南移兮，星鸟正而司分”；“彼庶卉之未动兮，固肇萌而先辰。”“盛德”，应是指天之运气，随时而变。《礼记·月令》云：“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孔颖达疏曰：“天以覆盖生民为德，四时各有盛时，春则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于木位，故云‘盛德在木’。”故“盛德迁而南移”明证是由春向夏季转化。董仲舒曰：“火居南方而主夏气。”《礼记·月令》又云：“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再有，关于星鸟。《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孔安国注曰：“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鸟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气节，转以推季孟则可知。”至于曹丕赋中“于是”之后所云之情景，乃作者对柳树在夏季时繁盛情景的联想，非此赋写作的时间。

三、“南皮之游”在何年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与吴质书》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后人对此著名之游多有吟诵。庾信《杨柳歌》曰：“昔日公子出南皮，何处相寻玄武陂。”又《冬狩行四韵连句应诏》曰：“鸣笳河曲还，犹忆南皮返。”谢灵运、李商隐等亦有诗作咏之。那么，南皮之游到底发生在哪一年呢？

卢弼《三国志集解》于《与吴质书》“南皮之游”下引《太平寰宇记》卷六五云：“《魏志》：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射雉于南皮，即此。讌友台在县南二十五里，与吴质重游南皮（弼按：“质”字疑“季”字之误），筑此台讌友，故名焉。”俞绍初先生《建安七子年谱》从《太平寰宇记》之说。

曹道衡先生认为，“《太平寰宇记》说恐附会”，并进一步论证道：“丕于建安十六年正月为五官中郎将，至二十年驻孟津四年间，频繁忙碌于从征、驻守，远赴离邳城五百里外之南皮射雉，纵有豪兴，亦未必有余暇也。”^①为此，曹道衡先生推论南皮之游“则在建安十年”。

前贤所作推论，似可商。窃以为应在建安十七年（212年），试为考证之。

第一、南皮之游应在十年至十七年间某年之五月。南皮时属勃海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九年，曹操围邳，袁谭退保南皮。十年春正月，攻破谭，冀州平定。此年后，才会有南皮之游。又《与吴质书》曰：“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元瑜，即阮瑀，参加了南皮之游，而“瑀以十七年卒”^②。故南皮之游应在十年至十七年之间。具体时间应该是五月。《与吴质书》作于五月二十八日，时间很明确。书中曰：“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既然是“节同时异”，那么曹丕忆及的南皮之游也应在五月。

阮瑀去世的具体时间应在十七年秋冬之季。不久，曹丕因“伤其妻孤寡”作《寡妇诗》和《寡妇赋》。诗曰：“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赋曰：“去秋兮就冬，改节兮时寒”。从诗赋中所描写的季节来看，应是十七年的秋冬之季。王粲亦有《寡妇赋》，应是与曹丕唱和。

第二、建安十年（205年）之非。《典论·自叙》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邳西。”族兄子丹，即曹真。曹丕二十三年《与吴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三人中包括曹真。十年暮春三月之时，曹丕和曹真在邳。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张燕传》载，此年曹操讨伐袁谭，四月前还邳并接受张燕归降。从以上史实可知，十年时曹丕应在邳留守。此年五月，不可能到南皮宴游。况且，曹操刚东征回来，南皮附近仍会有一些残余反对势力存在，为安全期间，曹丕也不宜大张旗鼓地前往南皮豪宴、纵乐。

第三、十一年到十六年，曹丕未到过南皮。十一年正月，曹操征并州高干，仅围壶关就历时三月。曹丕留守邳，常出外游猎，崔琰谏阻，丕有书报之。当年八月，曹操没有还邳，直接东征海贼管承。到十二年春，曹操自淳于还邳，随之北征乌丸，五月到达无终。曹植随军而往，未知曹丕是否随行。若曹丕留守，他负有重要职责，决不会本年到南皮游乐。

十三年五月，曹冲卒，曹丕劝慰曹操，作《曹仓舒谏》。

十四年春三月，曹丕随军至谯，秋七月自渦入淮。

十五年，《三国志》记载曹操活动有限。自十年

^①曹道衡、沈玉成：《曹丕南皮之游》，见《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38页。

^②《三国志·魏书·阮瑀传》

邺定之后，曹操每还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均有明确记载。十四年仅载，“军还谯”，未言还邺之事。疑因邺在大兴土木，曹操父子十五年到十六年七月间应居谯。建筑铜雀台等宫殿建筑，曹操应早有计划。十四年出征前，他特意将徐奕由魏郡太守徙为留府长史，并与之曰：“今君统留事，孤无复还顾之忧也。”^①直到十八年，邺城仍在建设中，曹操专门派梁习“使于上党取大材供邺宫室”^②。

十六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未载曹操还邺。此年七月，曹操西征应是自谯而往，同时遣曹丕还邺驻守。《三国志·魏书·文昭甄皇后传》载，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卞皇后从，留孟津，帝居守邺。”曹丕《感离赋》序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

以上可知，十年至十六年，曹丕没有到过南皮。那么，南皮之游只能在建安十七年。

第四、十七年曹丕到南皮的原因。十七年春正月，曹操西征马超之后还邺。同年十月，曹操南征孙权。此年四、五月间，曹丕应奉命到渤海。曹丕为何要到渤海去呢？这要从十三年的赤壁之战说起。十三年，曹操在邺作玄武池训练水军，为征讨孙权作准备。但在静水中训练出来的水军似乎不堪一击。此年十二月，曹操与孙权战于赤壁而惨败。于是，曹操决定在渤海训练水军。王粲《为荀彧与

孙权檄》云：“故使周曜、管容、李恕、张涉、陈光勋之徒，将帅战士，就渤海七八百里，阴习舟楫。四年之内，无日休解。今皆击櫓若飞，回舵若环。”吴云先生考证此檄“似作于荀彧来谯劳军之时”^③。荀彧劳军一事在十七年，上推四年，也就是说从十四年开始，曹操就已经开始在渤海操练水军。十七年十月，在又一次征孙权前，曹操专门遣曹丕到渤海视察水军训练情况，或者是下达水军前往征讨孙权前线的命令。从战果看，曹操这支水军发挥了很大作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十八年春，曹操进军濡须口，攻破孙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曹操对曹丕的渤海之行亦很重视，派曹真、曹休护驾前往。《三国志·魏书·吴质传》注引裴松之曰：“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曹丕确实到过渤海无疑，在由渤海返回时，路过南皮，有此著名之游。此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不久，正是人生得意之时，南皮宴游之乐气势壮观，亦很豪奢。

曹丕《与吴质书》云：“时驾而游，北遵河曲。”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之《阮瑀》曰：“念昔渤海游，南皮戏清汎。今复河曲游，鸣葭泛兰汜。”^④此诗又可证曹丕南皮之游和渤海之行发生在同一年，且阮瑀也是同游之人。

（责任编辑：石磊）

① 《三国志·魏书·徐奕传》。

② 《三国志·魏书·梁习传》。

③ 吴云、唐绍忠：《王粲集校注》，见《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

④ 《文选》卷三十。